

托马斯·M. 林赛及其对宗教改革时期的《圣经》解释

刘林海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100875,北京,中国)

摘要:托马斯·M. 林赛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苏格兰著名的宗教改革史学家。作为一名福音派信徒,其宗教实践和学术研究都深受福音派主张的影响。在对圣经的认识上,他遵奉以历史批判为主的圣经高级批判理论,将宗教改革视为圣经研究和理解的关键节点。他认为,新教改革家重新发现了圣经并赋予它新生,使它由形式化的知识汇编和教义的终极源泉变为信徒宗教生活的中心和指南,圣经成为神亲自对个体信徒救赎的直接启示。

关键词:托马斯·M. 林赛;宗教改革;福音运动 圣经批判

作者:刘林海,主要从事基督教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地址:邮政编码:100875,北京,中国。电话:18810062736。电子邮件:linhailiu@163.com。

1906—1907年,一本名为《宗教改革史》的书在爱丁堡和纽约同时出版。这部两卷本著作的作者是苏格兰格拉斯哥神学院教会史教授、院长托马斯·马丁·林赛(Thomas M. Lindsay)。林赛还有另外一个身份——自由教会(Free Church of Scotland)的牧师。该书甫一问世,便受到各界的好评,被誉为到当时为止用英语出版的最杰出的宗教改革史专著,他本人也一跃步入现代著名史家的前列。^[1]放眼当时欧洲的宗教改革史研究学界,应该说此类著作并不少见,但在当时教派等门户之见仍然深刻影响着宗教改革史研究的大环境下,能够得到基督教各派一致肯定的,确实不多见。20世纪80年代,英国著名宗教改革史专家A. J. 狄更斯这样评价他:“林赛是这个时期英国宗教改革研究史家中的杰出代表,其客观公允的态度是超越教派信仰主导下的宗教改革史研究的范例。其著作周详而高度专业。对宗教改革研究者来说,它们不但在当时卓然而立,而且价值持久”。^[2]这个评价可谓切中肯綮!虽然该书有许多细节上的问题,^[3]但瑕不掩瑜,也并没妨碍知识界对它的喜爱。1907—1908年,本书随即再版,此后多次印刷,至今不衰。^[4]此外,它还被译成日文、韩文、中文等出版。这个事实可以作为狄更斯评价的注脚,足见其生命力。

[1] *The Contemporary Review*, Vol. 90 (July, 1906), pp. 903-904.

[2] A. G. Dickens, John Tonkin, *The Reformation in Historical Though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85), 196-197.

[3] William Walker Rockwell, "Review of Book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2:4 (Jul., 1907), 874-876.

[4] 据笔者查阅 Worldcat 目录数据库结果,20世纪90年代以来,五家英美出版社先后在1990、1999、2010、2012、2013年重印过该书。

林赛的《宗教改革史》虽然广受好评,但除了几篇书评^[5]和狄更斯的简单评析外,西方学术界却鲜有对其人及其宗教改革史研究的专论。孔祥民先生曾对林赛的个人情况及该书的主要内容有所评价,应该是国内最集中的论述。^[6]林赛的学术视野宽阔,研究领域涵盖历史、神学、圣经等,尤其注重宗教改革时期的历史。在其众多的研究中,圣经是颇值得关注的一个话题。透过这个问题,既可以了解林赛对马丁·路德等宗教改革家的认识与把握,也可以深入了解19世纪中后期新教会内部对圣经的不同看法。本文分三部分:先结合时代大背景对林赛的生平做简单介绍,然后对决定林赛宗教改革圣经观的圣经批判理论进行分析,最后讨论林赛对宗教改革圣经理论的理解与阐释。

一、福音运动背景下的托马斯·M. 林赛

托马斯·M. 林赛于1843年10月18日出生在苏格兰南部拉纳克郡的莱斯马哈郛镇。他的父亲亚历山大·林赛是“摆脱教会”(Relief Church)的一位牧师,母亲是苏珊·埃尔文·马丁。林赛的家族在当地很有名气,也有令他自豪的历史。他的祖上是16世纪的罗拉德派信徒哈德希尔的默多克·尼斯拜特(Murdoch Nisbet),后者曾首次将《圣经》翻译成苏格兰语。他的曾孙约翰·尼斯拜特是虔诚的誓约派,曾参加过三十年战争。约翰的孙女伊丽莎白·尼斯拜特之女伊丽莎白嫁给了林赛的祖父托马斯·林赛。托马斯·林赛本人是尼斯拜特的九世外孙。^[7]他的岳父亚历山大·穆瑞·邓乐普则是苏格兰自由教会的重要领袖、著名政治家。

托马斯·M. 林赛聪明勤奋,自幼受到良好教育。^[8]他在1860年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第二年入爱丁堡大学学习人文学。林赛对哲学,尤其是对康德以来的德国哲学情有独钟,是最早一批认真研习德国哲学的爱丁堡人。他是当时爱丁堡大学哲学系最杰出的学生,在以优异成绩完成人文学科课程后,还获得了两份奖学金继续哲学学习。在学期期间,他做过著名哲学家坎贝尔·弗莱瑟(Camper Fraser)的助手和学生的哲学考官,还获得了一份牛津大学林肯学院的奖学金。1871年,他翻译出版了德国哲学家于博维格(F. Ueberweg)的《逻辑体系》。

作为一位有天赋的哲学学者,在同学们眼里,林赛将是前途无量的哲学教授。但是,他的生活在1865年发生了转折。这一年,他进入爱丁堡的由自由教会开办的神学院——新学院学习神学,逐渐放弃哲学。1868年,林赛从新学院毕业,同时获得了牧师资格,成为爱丁堡自由教会圣乔治堂的牧师助理,开始教牧生涯。1872年,他被自由教会全国大会推选为格拉斯哥神学院教义与教会史教授。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他一方面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工作,一方面投身教牧事业,为苏格兰自由教会做出了重要贡献。1902年,被选为该院院长,直至于1914年12月6日去世。

虽然我们无从得知林赛弃哲学而从神学的具体原因,但整体而言,他献身宗教事业,专门研究宗

[5] 主要书评见 *The Contemporary Review*, Vol. 90 (July, 1906), 903-904, Vol. 92 (Jul, 1907), 448-450; M. A. Hamilt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 Vol. 17, No. 1 (Oct., 1906), 140-143;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Theology*, Vol. 11, No. 2, Apr., 1907, 341; Albert Henry Newman, *The Biblical World*, Vol. 29, No. 5 (Jun., 1907), 394-395; William Walker Rockwell,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2, No. 4 (Jul., 1907), 874-876; Wm. E. Lingelbach,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31, (Mar., 1908), 226-227.

[6] 孔祥民 Kong Xiangmin: “评林赛的《宗教改革史》(上册)” *Ping Lin Sai de Zongjiao gaige shi (Shang)* [On Lindsay's History of Religious Reformation], 《历史研究》Lishi yanjiu [Study of History], 1988年第3期; “中译本序言”, 《宗教改革史》de *Zongjiao gaige shi (Shang)* [On Lin Sai's History of Religious Reformation] (上册), 北京 Beijing: 商务印书馆 Shangwu yinshuguan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2年版, i-x.

[7] Thomas. M. Lindsay, A Literary Relic of Scottish Lollardy, *The Scott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1, No. 3 (Apr., 1904), 260, note 2.

[8] 林赛去世后,《格拉斯哥卫报》*Gelasige weibao* [Glasgow Herald] (8 Dec., 1914, 第九版)曾专门刊登悼念文章。本文生平部分的内容主要据该文,不再注出。文献阅读地址: <https://news.google.com/newspapers?nid=GGgVawPscysC&dat=19141208&printsec=frontpage&hl=en>

教改革史,也并非出于偶然。这可以从其所处时代的一般特点中可见一斑。

林赛的一生,恰逢苏格兰历史尤其是教会史的一个特殊时期。他出生的1843年,正是苏格兰国教会——长老会大分裂的年份。在他去世前后,经过1900年和1929年的两次合并,他所在的自由教会再次与长老会合为一体。1843年5月18日,在爱丁堡举行的苏格兰国教会全国大会年会上,以查尔莫斯(Thomas Chalmers)为代表的部分牧师宣布脱离国教会,成立自由教会,与长老会成抗衡之势。他们放弃了所有的教会资产,以顽强的意志自筹资金,在短短的几年内新建了700多所教堂及附属设施,还建了堂区学校和爱丁堡的新学院、阿伯丁的基督学院以及格拉斯哥学院(1930年改为一三一学院)三所神学院,培养教牧人员。自由教会在爱丁堡、格拉斯哥及阿伯丁等苏格兰地区站稳脚跟,成为苏格兰宗教、政治、文教等领域的生力军。

苏格兰自由教会的出现既与苏格兰的政治和国教会有关,也与当时勃兴的福音运动有内在联系。

苏格兰的国教会长老会是宗教改革时期在约翰·诺克斯领导下建立的,后尊奉《威斯敏斯特信纲》。光荣革命后,苏格兰长老会的国教地位正式确立。1707年,英格兰和苏格兰正式合并,苏格兰教会的权力和独立地位也获得了法律的保障。1711年,英国国会通过了《恢复教会赞助者权益法案》。该法案恢复了被取消的苏格兰大贵族或地主等任命牧师的权力(宗教改革前,苏格兰三分之二的堂区教会掌握在赞助者的手里,他们有权任命牧师。这项权利在宗教改革时被取消),被视为世俗政权干预教会事务,侵犯了教会精神上的独立,遭到很多教会人士的反对。该法案不但导致苏格兰国教会内部出现了温和派和福音派(又称高派长老会)的对立,而且引发了教会的分裂。温和派虽然也反对世俗插手教会内部事务,但希望通过具体的操作加以限制,持妥协态度。福音派则坚决反对,不愿妥协。1761年,被温和派革职的福音派牧师托马斯·吉尔斯皮(Thomas Gillespie)正式组建独立的教会——摆脱教会,^[9]拉开了苏格兰长老会正式分裂的大幕。1832年的选举改革法案实施后,苏格兰国教会代表中的福音派逐渐增多并占据多数,他们与教会当权派温和派的矛盾也逐渐激化。1834年,苏格兰国教会全国大会通过了《否决法案》,赋予教徒否决由赞助者任命的牧师的权力。但是,这项法案及其实践遭到温和派和国会上院的反对。1842年,英国国会否决了苏格兰国教会全国大会的权利请愿法案。这个行为被视为政府干涉了教会内部的事务,侵犯了教会的精神独立,导致彻底分裂。自由教会捍卫教会的自由与自治,坚持由信徒民主选任牧师的原则。

从欧洲范围来看,苏格兰自由教会的出现和发展是与当时势头正盛的福音运动相表里的。从18世纪30年代起,以卫斯理兄弟和怀特菲尔德等人代表的英国国教徒发起了新一轮的宗教复兴运动——福音运动。这场运动波及欧美,也影响了苏格兰教会。福音运动与渐趋僵化教条的制度性主流新教不同,更强调宗教生活的中心是个人在获得救赎中的皈依或重生经验,更强调圣经是神的启示的权威。在个人生活上,则重视阅读并理解圣经,以圣经为生活指南。福音运动在本质上是藉信仰耶稣基督的救赎而实现救赎恩典,因此,其践行者更加注重耶稣基督在个人生活和实践中的榜样作用。他们追求的是内心的虔诚与圣洁,而非程式化的教义和义务。对他们而言,强烈的传教热情和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爱也是基督徒责无旁贷的义务。在当时的欧洲,福音派的这些主张还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随着经济的发展,工业化正在深刻改变着整个社会。传统社会的联系削弱,社会贫富分化加剧,教会上层逐渐脱离了下层,不关注下层贫困群体和工人的利益。这种状况在苏格兰尤甚。苏格兰的福音派抨击对工人的剥削和压榨,关注穷人等弱势群体,反对奴隶制,反对残忍对待罪犯,主张宗教宽容。他们还抨击当权派温和派不关心教会的传播事务,积极倡导到海外传播基督教,并在1796年

[9] 吉尔斯皮 JI'ersipi [Thomas Gillespie] 建立的教会名为 Relief Church,本意为摆脱赞助者和教会法庭的控制与束缚,实现在神职人员选任方面的独立自主。1847年,摆脱教会与第一次分裂出来的一些教会组成联合长老会(UPC)。同年,老林赛申请加入自由教会获批。中文文献有译为“救济教会”者,似不确。

首次提出了海外传教的问题。

可以说,作为在福音运动中成长起来的自由教会成员,林赛无论作为一位牧师还是学者,其言行都与这个大背景息息相关。在将这些理念付诸实践的同时,还从理论上寻求依据。在担任考卡登斯、布鲁米劳等郊区教堂牧师期间,他深入贫民窟的教徒家庭,了解他们的生活现状,帮助改善他们的生活。随着社会问题认识的更加深入,他还积极投入社会改革。他还呼吁改善高地佃农(highland crofters)的境况,是《佃农法案》的主要推动者。林赛还是苏格兰妇女高等教育的倡导和实践者,与他夫人一起创建了玛格丽特皇后学院(Queen Margaret College)。他还是女子高中团(Girl's High School Company)的主席,该组织在格拉斯哥、吉尔茂伦和海伦斯堡等地创建了帕克学校。他还撰写了诺克斯与苏格兰教育的专论,深入思考苏格兰教育改革。^[10] 林赛还热衷于传教事业,是一位出色的组织者。他在1886—1900年间担任自由教会外国差会委员会的召集人。这期间,他全力以赴投入工作。他熟悉了外国差会的整个工作流程,改组了传教工作运作模式,与国外的传教士保持密切联系,并到叙利亚等地视察传教工作。在他的影响下,自由教会三个神学院的许多优秀学生投身外国的传教事业。1890年,他前往印度传教站视察,并提交了详细的报告。^[11] 此后,他工作的重心逐渐转到学术研究上来,在短短几年内,先后出版了《路德与宗教改革》、《最初几个世纪的教会与教牧》、《宗教改革史》等著作。

二、圣经高级批判理论

1894年,林赛的好友威廉·R. 史密斯(William Robertson Smith)去世。以此为契机,他先是撰文总结史密斯的圣经研究成就,为其理论背书,接着又撰文阐述自己对圣经的认识,反驳以普林斯顿神学院部分神学家为代表的正统加尔文派的圣经观。^[12] 这些论述集中体现了他对宗教改革时期的《圣经》的认识,也出现在他撰写的《宗教改革》与《宗教改革史》等著作中。^[13]

要了解林赛对宗教改革时期圣经的看法,就不能不提到当时盛行的圣经批判研究及著名圣经学家暨东方学家威廉·罗伯逊·史密斯。整体而言,林赛对圣经的看法是与史密斯相关联的。除了一些细节上的不同外,^[14] 他们在圣经研究理论和方法上可谓所见略同。他们二人先后进入新学院学习,是志同道合的密友,在神学及圣经等方面观点一致。此外,在史密斯案件中,林赛深度参与并始终支持他,也是为应诉奔波的最积极的组织者和辩护团成员。史密斯去世后,林赛在悼念他的文章中谈到,在爱丁堡新学院读书期间,他们是学院神学协会会员,在圣经批判上观点相同,史密斯则是他们中公认的领袖。林赛还摘引了他自己撰写并由史密斯批注赞同的一篇相关论文的片段,以表明双方观点的一致性。^[15]

威廉·罗伯逊·史密斯于1846年出生在苏格兰的阿伯丁。1866年,他从阿伯丁大学转入爱丁堡

[10] Thomas M. Lindsay, John Knox, "What he did for Scotch Education", *Macmillan's Magazine*, May 1, 1870, 461-471.

[11] 报告全文见 *The India Mission of the Free Church of Scotland*, (The Edinburgh Press, 1891), 1-130. 该报告包括总报告和附录,其中附录部分是各差会站点房产、地产报告。

[12] Thomas M. Lindsay, *Smith's Doctrine of Scripture, Expositor*, Volume X (1894), 241-264; *Pioneer and Martyr of the Higher Criticism; Professor William Robertson Smith, Christian Literature and the Review of the Churches*, Vol. XI (May-Oct., 1894), 37-42. 下载地址: <http://babel.hathitrust.org/cgi/pt?id=uiug.30112109567948;view=1up;seq=205>. 他本人接着写了 *The Doctrine of Scripture; The Reformers and the Princeton School, The Expositor*, fifth 1, 1985, 278-293.

[13] Thomas M. Lindsay, *The Reformation*, T. & T. Clark, Edinburg, 1882, 186-191; *A 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 2 Vols., Charles Scribner's Sons, New York, 1906—1907, Vol. 1, 453-467.

[14] John Sutherland Black, George Chrystal, *The Life of William Robertson Smith*, (London: Adam and Charles Black), 1912, 449.

[15] Thomas M. Lindsay, *Pioneer and Martyr of the Higher Criticism; Professor William Robertson Smith*, 39.

的新学院学习神学,1870年毕业,成为自由教会的牧师,同时在阿伯丁自由教会学院教授希伯来文。林赛和史密斯在神学院读书的时代,苏格兰神学领域非常活跃,派系纷呈。当时的新学院是苏格兰神学研究的重镇,虽然名教授云集,但整体思想较为保守。不过,新的思想已经开始萌发,也出现了新神学运动。林赛指出,当时神学协会内部有三派,一是钦慕以弗里德里克·德尼森、弗里德里克·罗伯逊以及西敏寺教长 A. P. 斯坦利为代表的广教会神学派(broad church theology, 又称宽容派,主张从宽泛和自由角度解释神学),这派以年长的教授为主,是主导派;一是17世纪改革派神学的捍卫派,是加尔文派的正统代表;一是圣经批判学派的追随者,以年轻学生为主,林赛和史密斯是其中的成员。林赛和史密斯等对广教会的观点并不太相信,也看不上改革派神学,经常“以年轻人的狂热”与这两派作斗争。他们服膺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深信康德对历史价值的看法,认为无论了解事实还是理论,都必须知晓其历史。^[16] 19世纪中期前后,肇始于霍布斯和斯宾诺莎等的现代圣经批判学已经有了长足发展,并有了高级的历史批判和低级的文学批判之分。历史批判主要侧重历史角度的分析,重点将圣经视为一部历史文献,用历史科学的方法对其发生发展等进行研究,将它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文学批判则侧重文学,重点研究具体篇章的文本及作者等问题。林赛和史密斯受德国高级批判理论影响,主张利用科学的批判方法,从历史的角度研究圣经。^[17] 他们日后的圣经批判理论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

1875年,史密斯应邀为《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九版撰写了圣经、先知预言等词条,提出了与传统观点不同的看法。他并没有从宗教角度讨论圣经,而是完全把它作为文献材料,从历史和文学角度加以探讨。他主张将圣经从固定不变的神学教条中解放出来,把它视为一本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产生的文学作品,要像研究古代的文献那样,从历史的角度研究它,研究它的形成、流传以及变化。因流传转抄等原因,圣经的文字未必百分百正确,会出现错误,圣经批评则要改正这些错误。他还指出,圣经的“神迹”是非历史的叙事,犹太教的一神信仰是一个演变的过程,其中先知们扮演了关键角色。文章问世后,先后遭到正统国教会长老会以及自由教会内部正统神学的批判,认为他发表了“令人不安”的言论。阿伯丁自由教会学院的学院委员会要求史密斯道歉并撤销自己的言论,但被他拒绝。1878年5月,自由教会全国大会正式以“异端”罪名审讯史密斯。史密斯一案在自由教会内部和苏格兰社会都引发了很大的关注。对于林赛等人而言,这个案子并非简单的关于神学信条的是与非问题,而是关乎苏格兰自由教会一贯恪守的精神独立的信条。自由教会全国大会对史密斯的审判违反了精神独立的原则,必须加以改正。没有确凿的证据就剥夺他的教职,既违反了聘任约定,也有违圣经原则,是对教牧权的滥用。信徒有学术研究和公开讨论的自由,也有传播自己观点的权利,要加以捍卫。^[18] 虽然教会内部的部分神学家不断发难,但大多数人还是支持或同情史密斯。经过三年的艰辛斗争,法庭最终裁定异端罪名不成立,但也对他提出了严厉警告,要他不得再发表类似不当言论。不久,因他在新出卷的“希伯来语言和文学”条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1881年,他被辞退,失去了教职。后转任剑桥大学,教授阿拉伯语,先后撰写了《犹太教会里的旧约》(1881)、《以色列的先知》(1882)、《闪米特人的宗教》(1889)等,系统阐述了他的圣经研究理论。

史密斯认为,圣经本身是神的书,是神亲自对人所说的话,也是其救赎和爱的启示与见证。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这个内在见证之外,还有一个外在见证,毕竟这个精神见证是以成文的形式展现出来的,它还是一本书。作为一本书,它与古代的书籍一样,经历一个历史的过程,有它自身的历史。圣经非一人一时之功,从将单篇启示书录成文,到汇编成书,再到代代流传,人的因素始终存在。

[16] *Ibid.*, 38.

[17] *Ibid.*, 39.

[18] John Sutherland Black, George Chrystal, *The Life of William Robertson Smith*, 449-450.

“我们如何阅读并解释圣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教导。圣经本身是神的书,但任何人或者学派阅读和理解的圣经都是神的书加上很大程度的人为解释的因素”。^[19] 在圣经阅读中,神的书和人的理解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圣经的阅读使用及研究有两端,一是信仰、宗教教训及生活指南,一是历史。前者不考虑具体的历史,后者则考察具体的历史和流变,察明哪些是本真的,哪些是后加上去的,同时试图对传统方法遗留下来的难题和内在矛盾进行解释。教会传统延续下来的是教义研究和抽象的教条概念。“圣经是一本关于实践宗教的书”,^[20] 它没有后来的教条,如三位一体,基督的属性等,它展示的是活生生的基督,是他的生活、说教、受难和复活,通过实际的例子展示神的启示。对信徒而言,圣经是活生生的实践,也是活生生的恩典,是人和神交通与伙伴关系的介质。启示并非随着文本的问世而结束,它一直在历史中延续着,无论对古代的先知还是当代的普通信徒,其启迪作用始终如一的。因此,信徒在阅读圣经时,既要将它作为恩典历史的记录,也要把它作为历史自身的一部分。要正确理解圣经,首先要全面关注其人的一面,去了解神的启示这幕大剧的整体环境,了解所有涉及其中的人物的性格和感情。离开了具体环境,圣经就不再是同一个完美圣言了。古代的书籍就是古代生活的一个片段,要正确认识它,就必须把它作为一个活的生命体,作为其作者和及其所处时代的生命的一部分。只有回到其写作的时代,才能充分理解它。^[21] 要以同情的态度深入作者的思想,把思想做作为思想者及其时代的组成部分加以认识。圣经注释的全部中心都应该放在人的一面。^[22] 以历史为主的科学的批判方法则是正确理解的工具。“圣经批评是历史科学的一个分支”,^[23] 它并非现代学者的发明,而是历史事实的合法解释。其巨大价值在于,既可以解决圣经内在的难题和内在矛盾,又使得旧约变得更加真实。圣经研究的新成果不能仅限于象牙塔里,应该面向大众,将“现代圣经科学大众化”。^[24]

对比史密斯和林赛有关圣经的论述,可以发现,无论在理论还是在方法上无本质不同。林赛很赞同用历史批判对圣经进行研究,也是积极参与其中。当然,二人在具体操作上各有侧重。史密斯不否认其圣经教义神学维度的意义,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是弃而不论的。林赛则二者并重,试图寻求一种融合与平衡,反对完全抛开神学。^[25] 例如,他认为,摩西律法与旧约的历史并不冲突,传统的方式使用历史迁就律法,新的批判方法则是将律法融入历史,以达成“和解”。

三、宗教改革与圣经批判理论

对于林赛和史密斯而言,高级圣经批判理论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宗教改革休戚相关的。在他们看来,圣经的历史维度及其作为人的产物的一面是由宗教改革家发现的,圣经生命力的复活和对信徒生命的意义也归功于他们。可以说,宗教改革家的理论与实践奠定了圣经批判理论的基础。宗教改革是圣经批判的源头,没有宗教改革,就没有圣经批判理论。为了强调宗教改革在圣经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史密斯曾经以“批判理论和宗教改革神学”为题目做专题演讲,指出宗教改革最大的功绩在于复活了被错误解释尘封多年的神之道。林赛在总结史密斯的圣经研究时也特别强调这一点,认

[19] William Robertson Smith, *The Old Testament in the Jewish Church; Twelve Lectures on Biblical Criticism*, (Edinburg: Adam and Charles Black, 1881), 4.

[20] *Ibid.*, 13.

[21] *Ibid.*, p. 23

[22] *Ibid.*, 19-23.

[23] *Ibid.*, 1.

[24] William Robertson Smith, *The Prophets of Israel and Their Place in History*, (New York: D. Appleton and Company, 1882), viii.

[25] Thomas M. Lindsay, *Pioneer and Martyr of the Higher Criticism; Professor William Robertson Smith*, . 39; *The Doctrine of Scripture; The Reformers and the Princeton School*, 292.

为他准确把握了宗教改革圣经教义的核心之所在,那就是“信徒在基督中对神有个人的信任,而这使得神之道并非外在的字母,而是深层次的个人事务,信徒藉此可以步入与神的密切的个人交往,这是一个双向的渠道,一是神自己的圣言直通到人,一是人的个人信仰上达到神”。^[26]

在具体的论述中,林赛采取了分类对比的方法。一方面,他按照当时流行的进步观念,划分了中世纪和现代。在他看来,虽然宗教改革在个人宗教生活及复兴方面具有延续性,但整体而言,路德的改革是革命性的,是现代的开端。中世纪的落后与反动与现代的进步与革命是解释的基本前提。另一方面,在圣经教义方面,他又划分为中世纪、新教改革家和普林斯顿学派三个阵营。在林赛看来,所谓的普林斯顿学派,就是指以美国普林斯顿神学院神学家 C. 霍奇(Charles Hodge)、A. 霍奇(A. A. Hodge)以及 B. 沃菲尔德(B. B. Warfield)等为代表的加尔文派正统系统神学,教条化、经院化是其主要特征。普林斯顿学派虽然带有福音的特点,但与中世纪的神学观点如出一辙。在具体的价值判断上,他则将中世纪阵营与普林斯顿学派等同,而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赞同圣经高级批判理论的学者与宗教改革家并论。在圣经教义方面,宗教改革家和普林斯顿学派截然对立。

林赛认为,宗教改革家对圣经的看法可以归纳为两个原则和四个要点。第一个原则是,他们认为,圣经的最主要价值不在于其事实,尽管这一点没错,也不在于它是神学的终极源泉,“而在于它包含了上帝对每位信仰者救赎之爱的全部信息——他个人给我信息这个事实”,这是他们与中世纪神学相对的。宗教改革家的第二个原则是,建立在这个个人信息基础之上的信仰不仅仅是赞同神学命题或主张,而是个人对个人的神的信任。神在他救赎目的中自我启示,圣灵的见证激发这个信任,在圣经里并通过圣经得到验证,使人相信神正在其中说话。中世纪神学主要是思想和命题式的,新教神学则主要是实验性的、个人性的。圣灵的见证即强调了圣经的实验性和个人性特征,它几乎渗透在宗教改革神学关于圣经的理论的每一个论断中。在这个两个基本前提下,宗教改革家还有四点重要观点。第一,明确区分圣经与神之道。神之道犹如灵魂,神之道的记录犹如肉体。神之道的记录与神意的显现是不同的,神的意志和神的爱是不同的;第二,将二者区别开来,并不意味着圣灵的见证是独立于记录的,也不意味着记录部分对或部分错,更不意味着不能说记录就是神之道;第三,圣经的永无谬误与权威特征属于神之道,而不是在它自身。因为包含、展示或传达神之道的是记录,无谬误且有权威的是神之道。这种无谬误和权威是通过信仰,而非知识或思想上的赞同获得的;第四,神设计并保存了包含或展示其道的记录,他自己始终独自关怀并眷顾着置身世界的信徒。^[27]与此相对的是普林斯顿学派的系统神学。这种神学的圣经理论中世纪色彩浓厚,有将正统加尔文神学经院化的特征,破坏了其鲜活的生命力,把它变成了毫无生气的死的教条。其特点有四:第一,纯粹从知识或思想上理解圣经,目的在于知识的沟通交流,启示使人更加明智;第二,把神之道与圣经的区别变成纯粹的形式;第三,对圣经的永无谬误及权威理解是形式上的而非宗教观念上的;第四,在形式上认为圣经的永无谬误是指最初的圣经自传,错误是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出现的。

林赛认为,宗教改革家对中世纪圣经教义的革命与圣经的权威无关,因为无论新教改革家还是罗马教会的神学家,都没有质疑寻求圣经权威的举动。认为新教主张从字面和历史角度认识圣经的做法抹杀了圣经崇高权威的说法也是不正确的。宗教改革时期,新教和罗马公教的圣经无论在外延还是在内涵上都已经不同。新教不承认次经和伪经(外传),也不承认后世衍生出来的各种非法传统。在他们那里,信仰的权威唯有圣经。圣经不是对教义的启示,而是对个人的启示,神亲自存在于圣经的每句话里。^[28]对神的启示是通过信仰体验感知的,不是通过知识习得的。相反,罗马公教则一如

[26] *Ibid.*, 40.

[27] Thomas M. Lindsay, *The Doctrine of Scripture: The Reformers and the Princeton School*, 279-280.

[28] Thomas M. Lindsay, *A 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 Vol. 1, p. 459.

既往地承认外传及传统的权威。在经典的解释上,则恪守传统的四重解经法。在很大程度上,圣经是信条汇编或教义神学的源泉。

综观林赛关于圣经教义的讨论,可以看出,神之道对信徒个人生命的意义、神的启示的历史延续性以及从本质上把握圣经的永无谬误是其突出特点。在他的论述中,“个人的”字眼经常出现。对信徒而言,圣经不是信条,而是恩典和神救赎的见证,是今生和来世生活的指南。每个人直接面对神,藉阅读圣经与神建立直接的交通和伙伴关系。圣经是神个人化的启示及向信徒自我显现的方式。更重要的是,神的显现是通过一系列事件体现出来的,并非随着经书出现而结束,是一直在进行着的。启示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也是人类历史的组成部分。无论对古代的先知还是对当代的信徒,启示只有一个,而且是相同的,那就是神爱人的救赎福音。对人而言,神之道的永无谬误在于其对人救赎的本质,而不是指文本绝对无误。信徒藉信仰确立起对神救赎的信心,通过不断的体验和实践感知神对人的救赎恩典,保持信徒与神的伙伴关系。其中的一个重要渠道就是用普通的研究方法,藉此理解人类的实例或记录的历史可信性。这也是对圣经进行历史批判研究和解释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之所在。

作为一位虔诚的福音派信徒,林赛对圣经的看法自然受到福音派以圣经为中心和指南重建基督徒虔诚生活之理念的影响。从具体历史环境来看,则是苏格兰教会内部部分信徒对日益教条化和经院化的加尔文派教义不满和反抗的必然反应。虽然其对宗教改革时期的圣经的解释还比较笼统,没有区分不同宗教改革家之间的不同,甚至有矫枉过正的嫌疑,但整体而言,其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还是不容否定的,是了解史家与其史作关系的一个范例。

English Title:

Thomas M. Lindsay and His Interpretation of the Scripture in the Reformation

LIU Linhai

Research field: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Professor of History a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ddress: School of Histor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100875, Beijing, China. Tel: 18810062736. Email: linhailiu@163.com

Abstract: Thomas M. Lindsay was an eminent Scottish historian in 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 who contributed greatly to the field of Reformation Studies. As a loyal follower of Evangelical Protestantism, both his religious practice and academic research are deeply influenced by Evangelism. He was a follower and practitioner of the higher, or historical, criticism in Bible study, taking the Reformation as a starting point for studying and understanding the Scripture. According to his view, it was the Protestant Reformers who rediscovered and revitalized the Scripture, and made it a centerpiece and guide for Christian religious life, as a formal collection of knowledge and the ultimate source of theology. Scripture has become the direct revelation of the redeeming personal God for followers of Jesus Christ.

Key words: Thomas M. Lindsay, Reformation, Evangelical Movement, Biblical criticism